

• 内部刊物 •

西北历史资料

1980 3

目 录

✓ 对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点意见.....	刘伯鉴(1)
如何看待和处理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问题.....	周伟州(19)
六至九世纪的维吾尔人..... (5)	(苏)吉洪诺夫著 姬增录译(26)
中亚贸易和一八五一年的伊犁条约	(美)约瑟夫·弗莱彻著 赵春晨译(36)
天山游记(第二章 续一)	(俄)谢苗诺夫著 李步月译(43)
北魏平城时代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	(日)前田正名著 胡 戟译(60)
一千五百年来渭河中下游的变迁.....	李健超(68)
鸦片战争以后陕西植棉业的重要变化.....	李之勤(79)
陕西地名、县名简介.....	河 洛(86)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对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点意见

——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学的科学体系问题

刘 伯 鉴

这次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学的建设问题，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拟了要讨论的四个方面的题目，讨论的问题很集中。可以预料，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将把我国民族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借此机会，也来谈一点关于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意见。

一、科学上没有“极终真理”和千古不易的定论， 民族学应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化而发展、变革

对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任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可能存在着下面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这个问题讨论多年了都定不下来，民族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呢？第二种看法是，这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苏联的民族学家托尔斯托夫也都说过：“空谈定义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一定要空谈民族学是什么，那么民族学就变成了玄学”^①。第三种看法是，科学研究是随着人们对研究的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入而发展的，它所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无论是从深度、广度来说，都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一门学科，它的研究范围、任务、方法以及概括这门科学的定义一直不变的话，那只能说明这门学科没有什么发展。因此，不断地讨论民族学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说明我们对这门学科的研究是在不断深入的。

我赞同第三种看法，科学研究就是对尚未被认识的事物的探索，它的成果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原有认识的突破。突破就必然要引起这门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都是如此。如生物学的研究，它就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形态到结构、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过程。古典生物学只研究动物和植物的分类形态。就拿现在的分类与形态的研究来说，过去分类学仅仅是形态上的描述，现在却用系

统发育上的亲缘关系代替形态上的相似性，即抓住有系统发育意义的性状进行考察，排除由于适应环境而产生的生态适应的趋同性状。^②从理论到方法与以前相比大不相同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更进了一程。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为标志算起，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最近也有人写文章，认为这门科学研究的对象还没有弄清楚，大家的认识不一致，有人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有人认为经济学的对象，从动态来说是社会再生产运动；从静态来说是生产方式。^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肯定不会因为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讨论，便对这门科学发生怀疑，而动摇自己的研究工作。

近代民族学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解放前，我国民族学的研究受到了当时种种历史条件的束缚。在解放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台湾、东北、内蒙、华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相继沦于敌手，民族学研究工作者无法到上述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国民党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根本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少数民族备受压迫歧视，民族关系极不正常，民族隔阂甚深。去民族地区进行调查颇不容易。在各民族内部，劳动人民又分别受到山官、头人、土司、贵族、农奴主、牧主、地主、僧侣、教主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各阶级的真实情况、阶级结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种种问题弄清楚。加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仅有解放区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民族政策和民族情况，而更多的民族学研究工作者还不甚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了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开展。

解放后，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民族学的研究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三十年来，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前进的道路上虽然也遭受过挫折，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民族学无论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与过去相比都大大地迈进了。

过去民族学只是研究处于原始社会或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的，而我们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集中对原始、奴隶、农奴三种社会形态进行了调查研究；过去只把原始宗教的研究放在民族学研究的视野之内，而我们开展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各种宗教如喇嘛教、佛教、伊斯兰教的研究。我们的民族学研究，已经超出了过去传统的研究领域。这一切向我们提出了如何重新认识民族学研究的范围问题。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各民族经过社会改革，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

去的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农奴制社会都已成了历史的陈迹。各民族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单一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多种经营、农牧结合、工农并举的综合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精神面貌，思想意识形态的巨变更不用说了。现在各族人民正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民族学是以研究现代各民族的现状为其传统的，怎样继承和坚持这个传统，开展各民族现状的研究，也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探索的课题。这个课题，在民族学会筹委会所列的“民族学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议题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始新长征的时刻，民族学跟上时代的步伐，集中讨论民族学研究自身的发展问题，可谓正逢其时。通过这次学术讨论，将大大促进我国民族学这门学科的发展。

二、通过对民族学本身的历史考察，来探讨它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如上所述，开展这样一次怎样进行民族学研究的讨论是很有必要的。如何来开展这个讨论呢？这里想先引用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序中的一段话：“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④。恩格斯的话，虽然是对经济学的问题说的，但这个原则，为我们怎样开展民族学的讨论指出了方向。就是说，我们讨论什么是民族学，不应先去构筑这种或那种“僵硬的定义”“把它们限定”在里面。“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现在就从考察民族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入手。

有关民族学知识的记载发端很早，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民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却是十九世纪的事情。它的形成，标志着民族学的研究已从过去只对某个民族同共同体作单纯的直接观察的记录描述，进入到对各民族的状况进行比较研究的阶段。所以蔡元培先生当年把西方民族学介绍到我国来的时候，根据西方研究的情况，给民族学下了个定义，说“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⑤

民族学从最早对单一民族状况进行直接观察描述，到后来的比较研究，这里有一个对它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西方近代民族学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后，由于欧洲航海事业的兴起，特别是新大陆美洲的发现，欧洲人纷纷到海外各地去，接触那里的民族，通过直接观察，记录描述他们的有关情况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有一个时期，就把民族学

只看作是以现代各民族为对象主要采用直接观察的方法而予以描述记录的科学。这个概念反映了那个时候对民族学的认识水平，这种认识被后来的应用民族学打破了。

不过，只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认为民族学仅仅是对不同的民族作直接视察而描述的科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民族学在思想方法上受实证主义的影响。

西方民族学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而他又是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因此，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很早便渗透到民族学中来了。实证主义哲学否认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可知性，认为人们不可能也不必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孔德在他的《实证哲学讲义》中就说过：“……我们认为探索所谓最初的原因和极终的原因，都是绝对不容许和毫无意义的”^⑥他认为科学的任务只在于描写人的主观感觉。

美国有一位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名叫克娄伯。在他的代表性著作《宣言十八条》里也宣称：在历史上没有象理化科学的定律（第15条）；没有社会种类标准的文化型态或阶段（第13条）；真正的本能存于社会现象的底面及起源，但不能由历史研究之（第5条）；地理或物质环境是文明所利用的材料，而不是形成或解释文明的要素（第7条）；历史只研究为一定条件的境状，不研究原因（第16条）；历史的原因论便是终局论（第17条）。^⑦很显然，这种思想的渊源是来自孔德的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哲学家们标榜实证主义是只承认“实证的”（“确实的”）的“科学的哲学”。其实他们把科学唯心地理解为感觉、表象和体验的总和，否认客观规律，这就背离了科学，因为科学是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证明，持上述观点进行研究的学派，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就连同属于这个学派的高登卫塞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他们怯于从事观念上较广阔的以及较近思辩辨的问题，只尽力于所谓特殊的具体的调查，因此这一派的研究几乎没有“综论”的著作，所以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一些的人类学家讥讽他们为“无生产”。^⑧

那么，强调“直接观察”是不是就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呢？那还不能这么说，这两者不能等同。片面的强调“直接观察”，也就是说强调的只是“直接感知”。

“直接感知”是内涵不确定的字眼，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可以按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理解；对于唯心主义者说来，可以用他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来理解；对于不可知论者说来，也有不可知论者的理解。所以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马赫主义

者时说：“‘直接感知的东西’，和‘实际感知的东西’这类字眼是马赫主义者，内在论者及哲学上其他反动分子的糊涂话，是不可知论者（在马赫那里有时又是唯心主义者）用以伪装唯物主义者的假面具”。^⑨

在这种字眼的后面，隐藏着两种倾向、两条路线、两个结论。它可以导致唯物主义，也可以导致唯心主义。列宁说：“一条路线是：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模写，我们知道这些物本身，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这就是不可知论者所不同意的唯物主义。而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关于这些物本身（……就是自在之物……）我们是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十分肯定的声明”。^⑩实证论者也就是不可知论者。前面提到的克娄伯的宣言，就不正是这样“十分肯定的声明”么？

对“直接感知”和“直接观察”，即使我们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去理解，那也还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的问题。通过直接观察所能得到的只是生动的直观的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片面、现象和外部联系。虽然现象可以部分的体现本质，它是本质的一个环节，但本质与现象是有区别的。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是多余的了。”^⑪如果民族学的调查，仅仅是对民族作直视的记录描述，那只是作了概述感性材料的初步工作，还只是由直接感知过渡到抽象思维的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而没有完成对它的科学认识。而民族学的研究，是要透过调查的民族情况即外部的表面现象，揭示不是寻常直接观察得到的关于民族发展的具有规律性的、本质的东西。

是不是我们过去探讨民族学方法时强调过“直接观察”这一术语，都是受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呢？当然不是。第一，前面讲过了，它与民族学的发端形成的历史背景有关，它是从历史上沿用下来的。第二，它与实证主义也不能完全划等号。也如前所述，它还是一个三岔路口上趋向未定的问题。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指出隐藏在那伪装的假面具后面的陷阱；只不过想剖明我们大家所熟悉和运用的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调查方法、认识路线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同奉行实证主义的直接观察的方法、认识路线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根本不相同的。

再来考察一下民族学的“比较”方法或者“比较民族学”的问题。将“比较”的方法用于民族学研究，这比从前只观察描述民族的情况进了一大步。将各个民族的情况联系

起来进行比较,突破了原来对民族只一个个孤立的、个别的认识的状态,使人们有了把各个民族联系起来的认识,从而才将民族学置于研究的基础之上,使民族学开始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比较”的方法,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所用的重要方法之一,运用它可以认识事物的某些侧面。但是要完全认识事物的本质,单靠它是不够用的。民族学研究如果仅仅用比较的方法,比较那些直观描述的各民族材料,所得到的不一定是科学的结论。如传播学派把一些民族的文化类型加以比较,发现有某些相似之处,便认定这是它们之间相互传播的结果。他们没有从各该民族自身的社会发展规律去研究,没有考察是否由于发展在一定阶段上所表现出的同一水平的相同类型。我们承认各民族的文化是相互交流的,但它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文化传播论者甚至强调到这样绝对的程度,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是从埃及一地传播到全球各地的。这种结论自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

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的手段和方法是多方面的,有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科学的理论抽象等等,只运用“比较”这一种方法,是不能单独的提供对事物的完整的、确切的、本质的认识的。从我们自己多年来的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工作经验,对这一点有着比较深刻的体会。

蔡元培先生五十多年前为介绍西方民族所写的那个民族学定义,是根据西方民族学的情况写的。那个定义,只讲了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没有讲它的研究目的。而研究的方法,今天看来科学性也不足,因此,那些提法,似以不再沿用下去为好。

顺便提及一下,蔡元培先生是位深有卓识的教育家,他提倡“学术思想自由”,活跃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中国新文化教育史上是有过贡献的。可是他的“兼容并包”的办教育主张,也使他自己的思想“泥沙俱杂”。所以,他在民族学方面的某些观点,也是不足为训的。从他一度服膺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什么货色呢?是他为了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编造所谓“互助”的谎言,而写的一本《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在这本书里,他把一些民族学材料,主观唯心主义地堆积在一起,胡拉乱扯地解释,企图证明“互助为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⑧,是社会进步“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的力量,”^⑨“它从民族扩展到种族的联盟、民族,最后最低限度上在思想上扩展了整个人类”^⑩,据他认为,只有取消阶级

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扩展互助的范围，就是我们人类更高尚的进化最好的保证”。

⑭这本书既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又是无政府主义的一部社会发展史。蔡元培先生从民族学观点到政治观点，都一度深受这本书的影响。他说什么：“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知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斗争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故马克思所主张阶级斗争，绝不适宜于中国也”。⑮和盘托出了他当时害怕阶级斗争，害怕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那种逆潮流而动的思想。

民族学当前的研究方向、任务和方法是什么呢？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民族学是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起源、它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社会形态等等的一门科学。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种科学，就在于探索其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发展规律。民族学的研究，一般来说，固然是注重运用实地社会调查的方法，主要着眼于各民族现实状况的研究的，可是为了说明各民族现实之所以存在的来龙去脉，也就不能不涉及和追溯它的历史的发展。今天的现实，既是昨天、前天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明天事物发展的新起点。民族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各民族的现实出发，来探索它们的历史发展的规律，阐述诸如民族的起源、形成、繁荣、发展、离合和消亡的规律。正如恩格斯讲过的一句非常深刻的话那样：“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⑯

民族学和民族史毕竟是不同的。民族史是通过大量的翔实的栩栩如生的史实，即大量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各种机遇的叙述，来展现历史发展的图景。各民族的历史上的风云际会，充满了繁杂多变的种种偶然和机遇，在偶然性的后面常常隐藏着它必然性，在表面上看去是发生着偶然性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总是服从于内部隐藏着的规律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民族史就是要透过这些，从偶然性的堆积中，把必然性表现出来，把人们活生生的主动性、创造性与历史的必然性统一起来。

民族学研究的是民族历史发展规律，反映它的历史进程，但它不跟在历史事件后面亦步亦趋。在民族史上，某个政治事件、某个历史人物或者解决某一战役的重大决策，常常在某段历史时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就不见得有那么重要了。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

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⑩民族学对民族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与民族史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摆脱了历史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民族学所注意的是民族发展在某个阶段上的典型形式，它所注意的是那具有必然性的东西。民族学的研究，虽然无例外地也要从个别的、带有偶然性的事物开始着手，但当它一经抓住了这些事物的典型的时候，便摆脱历史的形式，扬弃那些起干扰作用的偶然性的东西，去考察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趋向，探索那些带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做出合乎辩证的逻辑的概括，也就是要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从时态方面来看，历史学与民族学也是不相同的。历史学研究所注意的是按年代时序考察发生的历史事件，民族学注意的是一段时间里的社会内容。而这一段时间与历史事实的具体年代的跨度是不尽相同的。它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段时间，如社会制度的发展，就经历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因此可称这一段经历的时间为历时态。如农奴社会，从它的社会性质来讲，是一个有别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社会经济形态。从时态来看，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序列上，是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之后的早期封建社会形态，它是一个历时态的历史性形态。考察社会形态划分它的早期、中期或晚期，是以社会发展的系统的阶段来划分的。如果我们综合研究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西藏藏族农奴制、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农奴制，只考察它们各自发展在什么阶段上来论先后，而不以具体的史实的历史年代来定迟早，因此农奴制社会这段历时态，与史实的具体历史年代岁月的跨度不尽一致。民族学在研究某一个民族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的时候，就要从历时态的角度去考察，在综合研究几个民族同一水平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就从同时态的角度去考察，这在方法上又是与历史学不尽相同的地方。

三、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自应有它本身的科学体系

民族是一个整体，对它的研究一方面固然需要从总体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它，例如民族识别的研究，就是这样的综合考察。但如果只把握现象的总的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个总画面的各个部分的细节，而细节不清楚，对总画面也就不可能有具体的深入的了解。为了更加深入的从各个侧面分门别类的研究，于是把研究民族的学科，分成了民族理论、民族语言、民族史、民族学、民族经济学、民族文学艺术等等，

随着研究的发展，当然还可以越分越细。民族学的研究，不仅只与这些学科相互渗透，而且它还要借助于其他一些学科如人类学、考古学等知识与方法。如民族学可以从研究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去吸取有益的东西，它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如探讨它的风格、表现的手法）去研究，而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研究民间文学中所反映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风俗习尚，家庭婚姻、阶级关系等等。

民族学的研究，涉及到一个科学群，但它不是这些科学的综合研究，也不是一些科学的联盟、“拼盘”，可以把它分解为各个部分而化为乌有。民族学有它自己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它只是吸收这些科学的研究中的一部分内容来丰富充实自己的研究领域。博采百家、自成一体。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自应有它本身的科学体系。

民族学的体系，不是那一个人所能杜撰得了的。它是根据民族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加以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同时又有待于我们用新的成果去丰富它、发展它。由于个人所接触的内容不同，研究它的方法不一样，因而总结和归纳而提出的看法就必然不一致，但它总是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希望通过这次讨论把各个侧面的合理部分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大体为大家所承认的初步方案，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它，修正它、丰富和发展它。为了讨论起见，这里也提一点个人的想法。

民族学既然是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繁荣、离合、消亡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规律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依照历史的观点，民族学的科学体系，应当是以它的内容按历史发展的先后序列呈纵坐标递次互相衔接起来的。一些属于某一社会形态或某一阶段内的专题，则在纵坐标的相应阶段上按横坐标序列。如果从时态上来分，它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已经终结了的，可称它是往时性的；一类是研究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还在延伸或者正在萌芽展开的，可称它是现时性的。研究民族的历史发展上有过的往事，是阐明它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研究现时性的现象和问题，是为正确处理现实问题改变现状和预测将会出现的问题而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民族的发展繁荣朝着可预见的、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理想的方向迈进。

历史学、考古学都有它们自己的断代，研究者可以在各自熟悉的某一断代领域内发挥专长。民族学过去一向被认为只是研究原始社会史的，时间就断在原始社会，用不着再分再断了。根据我国民族学的发展，不仅大大突破了那个传统的框框，开展了三种社会形态的研究，而且要开展民族的现实问题的研究，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了。民族学是

否也可以从社会形态,或者按往时性、现时性来划分它的断代,这样不仅避免了以前那种认为民族学应以某一研究内容为中心为重点的一些片面性的理解,而且它有助于全面地推进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使之向着纵深方向发展。

如果我们按往时性和现时性两者来划分的话,就可以把民族的起源、亲属称谓的起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以及一些古老的社会化石性的遗存研究等都归并于前一类。虽然存在于民主改革前的三种社会形态,在开始调查研究的时候,还是现时性的现状,可是从社会改革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时过境迁它又变成了往事,一些情况只保留在老人、中年人记忆中了,它正成为往时性的。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我国历史舞台上活动过的民族,如研究他们的起源、迁徙、融合、分离、消亡、社会制度等等,自然也属于前一类。关于前一类研究,大家都是亲自参与的,非常熟悉的,用不着赘述。

至于现时性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开展起来。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前一段,民族学研究者忙于参加少数民族三套丛书的编写工作和三种社会形态的研究,把研究的注意力都放到这方面来了。二是前一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不正常,除四人帮横行、十年浩劫、毁灭科学文化外,还有就是一切工作都唯意志论,不尊重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凭长官意志指挥,它不需要科学根据,用不着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的资料,致使民族学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几乎成了不可涉足的禁区。现在党的路线端正了,民族地区要根据民族的特点、按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办事。民族学研究民族地区的现时情况大有可为,这不仅是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民族学发展的需要。当前民族地区的现实,应当成为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课题。苏联研究所谓民族过程,西方的应用民族学都是研究民族的现实问题的。尽管这一研究领域有些方面可能超出了民族学的范围,但民族学研究应当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下面我想例举几项属于现时性的民族学研究的内容,以求和大家一起探讨。

1. 民族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

自然界,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自然环境对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虽不一定有决定作用,但它的差异对人类生活有重大影响。土地的特性、土壤肥力、气候、森林和植被、动物界、水域、矿藏等既是人类赖以生活的生态系统,又是人类赖以进行生产的自然资源。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各民族在组织生产上就只能根据所处的特定条件来选择。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有广袤的草原,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畜牧业发达;

赫哲族、京族临河濒海，便发展渔业，鄂温克族活动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狩猎则是他们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上是不同的。人们利用这些自然条件的情况，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达到的水平，决定于人们所创造的生产资料、技术基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就是说是利用这些条件的能力。生产的发展要求扩大利用人类已知的自然资源，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工业越发达，需要自然界和生态系统提供的东西就越多。但我们绝对不应该“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⑨自然界稳定的支付能力是有限度的。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现代化工业和农业而同时又要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超限度地向自然攫取资源，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破坏生态系的平衡和稳定。

前几年内蒙、青海等地垦荒破坏草原生态系统就是明显的例子。草原生态系统，是由各种牧草、动物、细菌等生物和土壤、水、空气、无机盐类等非生物构成的综合体，各种牧草是草原的自养体，它以水、二氧化碳、无机盐类等为养料，由叶绿素吸收太阳能并转化为化学能，制成碳水化合物而放出氧气，这就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这些有机物（主要是各种牧草）供草原上的牛、马、羊及鼠类、昆虫等草食动物用，而这些草食动物又供人及一些肉食动物用，人及这些动物和一些原生物，分解为无机物，还原给自然界，再一次供给绿色植物，这就完成了一个循环周期，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就是这样沿着一定的循环途径，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收支与转化的。^⑩不仅草原开荒，从根本破坏了草原的自养体，就是草原载畜量过多，也会破坏草原的生态平衡。

不少少数民族与森林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云南60%的少数民族住在山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森林地面积占全州面积80%，全州110个公社，有40个公社在国家森林工业局的辖区范围之内。东北大兴安岭，海南岛黎族地区，甘南白龙江流域藏族地区都有大片原始森林，广东、贵州、湖南的少数民族都与森林有不解之缘。近年来森林砍伐过量，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云南一年烧柴消耗的森林资源就有1700百万多立方米，超过年生长量的34%！林区烧柴和森林火灾消耗的森林资源，远远超过国家计划内的采伐量。解放初期，海南岛有原始森林1200多万亩，现在只剩下360多万亩。举世闻名的花梨（降香）是黎族地区东方县最大特产，解放初期有六个花梨基地，自然生长的花梨达四万亩以上，现在六个自然基地已砍光。吉林一年生活烧柴二百万立方米，相当于全年采伐量1/3。延边1978年火灾损失材43万8千多立方米。西双版纳、海南岛等地原始森林，由于乱砍滥伐，盲目开垦，加重了寒害、旱害和台风灾害。水土流失、土壤肥力恢复十分缓慢。

还必须保护野生资源，有些野生资源的用途我们还不认识，不要盲目的搞掉了。有些珍贵的野生资源不能过量采集，虫草是我国独有的珍贵药材，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一吨虫草可换回五十二万美元。虫草分布有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雪线地带，青海省产量占全国40%，由于采集过度，产量急剧下降，1968年青海产量只等于最高年产量的6%。

天山、祁连山的冰川，是新疆、河西走廊各族人民生活、生产的重要水源。祁连山有冰川约3000条，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蓄水量达1000亿立方米，每年流入河西走廊的融水约10亿立方米，占整个河西地区总径流量的14%。对于冰川的利用，也应注意涵养冰川，控制消融，加强山区自然保护，以维持生态平衡。

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讨论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森林法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法，用法制来保护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平衡，这对促进各族人民的生

产，改善他们的生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有的人就认为那里的资源、土地可以随意取舍，毫不珍惜。工业、矿场、运输、城市建设等不是精打细算的设计布局，占用土地的数量相当大，矿渣、废料随地弃置，浪费不少土地。为了加强土地资源的保护，也应当制定单行法规，或征收利用土地、矿山的费用，用经济手段减少占用土地或利用不适用于农牧业的土地，保护土壤免受污染。苏联科学院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研究委员会副主席恰恰图罗夫所写《生态学的经济问题》一文中也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②因此人们需要掌握森林、草原、耕地、水域、植被等生态系统今后可能达到的支付能力，即再生资源的极限性，预测非再生资源的贮量和今后开采的速度，研究自然界和民族发展之间的互相关系的最优方案。我们不只是消极的适应生态平衡，而是要合理的利用自然环境条件，有意识地按照自然规律把自然景观改造为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文化景观。恩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

过去我们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时候，都调查了各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只是那时还没有保持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研究考察，今天我们来研究民族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这也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丰富了民族学研究的内容。

2. 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写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②民族学要深入认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一个民族的内部结构，必须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生产关系上去考察，这也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社会。

关于经济基础方面的调查研究，我们并不陌生。不过，以前研究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都是自然经济，社会系由许多同类的经济单位所组成，每个单位都进行一切种类的生产，经济结构简单，调查时只需要选择若干点作一些抽样调查，便可以作出定性分析。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比以前复杂多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都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摸索。

民族学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基础的目的，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了解民族发展与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展望民族发展的前景。过去我们从苏联引来了一个概念，认为一个民族的经济，它的工业经济产值占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0%以上者，这个民族才算现代化民族。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难道只有工业现代化才算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算现代化？牧业现代化不算现代化？全国性的大型工业，不可能都布局在民族地区，难道它就不是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与民族地区的发展没有关系，各民族没有份？在这种错误概念的影响下，也引起有的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生产布局不够合理。如有一个地区，为了改变“手无寸铁”的局面，花了500万元，建立十三立方米小高炉，结果一吨铁的成本要500元，只有不到130万人口的地方的地方财政，怎么能一直补贴下去？民族地区经济的技术结构，现在一般比较落后，但也不能固定去看它。民族地区畜牧业实现电气化、机械化将来要比农业地区早。畜牧业机械不像农业机械繁杂，比较容易装备，问题是要解决好能源。能源问题也正在突破，在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草原上，我国第一座太阳能电围栏建成并使用，围建草库伦面积达6300亩。我国草原辽阔，海拔高，日照长，在畜牧业中有充足的太阳能可以利用，草原上还有非常充裕的风力，它也是一宗巨大的能源。

研究经济结构的具体内容有：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经济区划结构、消费结构、职业结构、投资结构、商品结构、价格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等。

最近，内蒙、新疆等民族自治地方对农牧业经济结构和农业内部的经济结构都作了调整和新的布局，这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3. 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研究

民族人口是民族盛衰的重要标志。人口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它不仅包括有量的方面,也包括有质的方面。固然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但仅从量的变化还不足以完全说明民族的盛衰。现在欧洲有些经济非常发达的民族,人口有的还在下降。美国人口问题专家菲利斯·皮奥特罗兹说:现在“正发生人口学革命,出生率下降比预料快得多。”我们不能说他们的民族正在走向衰落。托马斯·埃斯潘舍伊德在为《人口与发展问题评论》准备的一份报告中强调指出,一个民族的幸福不取决于人口的增减。他认为,“民族的幸福取决于它的经济政策的英明程度,要比取决于经济政策的基础——人口结构——的程度为大”。^④现在世界上有些经济不发达的民族,人口在急剧增长,不能说这是这些民族强大的表现。马克思曾在《资本论》里引述过赛·兰格的一段话:“贫困在达到引起饥谨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⑤所以仅从一个民族数量上的多少,难以说明它的强弱。

遥想当年,蒙古族驰骋欧亚,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主宰民族的时候,它在人数上比汉族要少,难道可以说它是弱小民族吗?满族入关,建立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时候,在人数上比起汉族更是少得多,我们能说它当时弱小吗?这个问题仅从民族人口的数量方面不能得到满意的说明,还要从民族的社会历史、民族的素质等方面去寻找答案。所以研究民族人口,不仅要从量的方面去研究,也需要从质的方面去研究。

我们研究民族素质,是要结合一个民族的社会制度,生活环境,文化物质生活条件,来研究如何提高民族的基础文明,也就是文化素质;如何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移风易俗,促进提高民族的健康水平,也就是增强各民族人民的身体素质。

现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水平都不高,少数民族的基础文明的水平更低,与肩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愈是落后,自然条件特殊,物质资料丰富,就更需要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去装备,去开发。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些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增长的百分之四十、六十甚至八十,是靠采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取得的。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没有很好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行,因此,必须提高民族的基础文明,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

一提起少数民族地区,有人便认为那里文化生产落后,科学研究更谈不上。殊不知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是一些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他们那里特殊的自然条件,就是天然的科研试验的基地。这样的基地不是人工模拟所能做得到的。如宇宙线研究,是高能

物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我国建立的高山宇宙线观察站,就是设在云南和西藏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尖峰岭,是热带地区的一个包括各种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物种资源宝库。在这里中国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已经专门成立了生态研究室,英国皇家植物学会植物园副主任格林来这里后说:“这里是未来资源的一个宝库,子孙后代会从中得到很多资料”。新疆巩留新源山区的野果林在古地理、植被发展史和果树种树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民族地区设置的科学机构远不止这几个,在这些研究机构中,有没有当地少数民族成员参与研究?注意培养了少数民族的中高级研究人员没有?要培养大批的少数民族的科学家,就必须从提高整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做起。现在少数民族的教育情况与汉族相比,差距更大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研究的问题。

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与社会环境、生活条件有密切关系。不同的民族血统与生活环境,形成了各民族的形态与生理机能的不尽相同。如藏族人民长期生活在高原,在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吸入氧中的氧分压正好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在高原低氧刺激下大大促进了人体的某些器官发育过程。他们的肺和肺动脉树发育好,为气体交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地。他们的心脏特别是右心强大,为加强肺的血流灌注提供了一个动力系统。冠状动脉的侧枝丰富,心肌对氧的提供取增强保证了心泵的能源供给。他们的身体通过改变自己的机能和结构,达到了与高原低氧环境建立新的对立统一。南京一所小学测定该校学生的身体发育素质,解放后比解放前有了显著提高。1979年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联合组织调查人员对十六个省市1200多所大中小学的二十四万五千多学生进行了身体形态、机能、素质的调查试测,积累原始数据500多万个。这次试测为研究青少年的身体发育作好的开端。民族学也可以进行民族身体素质的研究,在不同民族中选点、定期对青少年进行测试,通过试测,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青少年体质现状与趋势,生长发育水平及其特点和规律,为探索增强下一代体质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4. 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研究

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总是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家庭的性质、职能、形式、结构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的。每个民族的各自传统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经济关系、思想意识形态、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中的地位等等都影响着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的家庭、婚姻形式是多样的,解放后随着社会形态的飞跃变革,这方面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有很多问题值得民族学去很好地研究。如最近通过修改的《婚姻法》,明文禁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